

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我们的策略

肖建华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在世纪交替之际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再一次响起。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就曾借其主人公之口不无夸张地宣称：“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在引用并详细分析了德里达这句耸人听闻的话之后，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文论家米勒总结道：“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有繁荣的时期。”^①在米勒看来，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衰落或消亡的命运。问题是不是果真如此严重可以商榷，但米勒略带偏激的论断无疑触及到了我们当前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痛处。毋庸讳言，比起以前文学

的热烈盛况，我们当前的文学生产和研究状况的确不容乐观。无论从质量还是社会影响力来说，都表明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显现了败落的迹象，或者换句话说，当前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危机。但是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和文论研究会面临危机呢？出现这一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地分析讨论它，并且为了叙述的集中和明确，我们将只以中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为例。

经过笔者的仔细梳理，发现研究者之所以会感到当前中国文论面临危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其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学理论作为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和功能开始隐退，文学理论的政治轰动效应也随之消失了，它开始逐渐被一些另有所图的人从政治的中心置于文化的边缘，仅仅作为文化知识谱系中的一个分支而存在。这引起了一些习惯居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心的学者的焦虑和不安，他们认为早已估计到这样的文学理论存在危机或将走向终结了。

其二,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没有形成自己有独创性的文学思想和体系。这使得一些论者在面对中国文学现实的时候,总有一种阐释的无奈和焦虑感,或者说,末日感。他们觉得自己勤勤恳恳做了一辈子文论研究,到头来既不被历史所记住,也不为现实所需要,这是很令人悲伤的。由于“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和“文革”时期把传统文化全部当作封建文化进行批判,这使得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几代学人基本上没有接受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在学术和文化上我们可以说都成为了一群无根的人。这一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上的重大缺陷无疑导致了我们在创新上的难以为继。新时期以来,在跟世界接轨的呐喊声中,我们又总是忙于跟在西方后面引进其最新的理论思潮而缺乏理性的反思。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内,西方各种理论都在我们的文学理论界轮番上演了一阵。但是,我们在这种理论的狂欢中,是不是遗忘了什么呢?我们自己的文学现实和理论创造到哪里去了?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理论中,有哪些东西是自己的并针对自己的文学现实的呢?毫无疑问,在西方理论面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界显得焦虑不安,又不知所措。

其三,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横向移入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终结者宣言”总是不断地充斥在我们耳畔。如“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等等。后现代主义素以平面化、无深度著称,它对一切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持强烈的敌视和拒斥态度。以对文学进行理论反思为己任的文学理论自然也在它的消解之列。

其四,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地丧失了理论思辨的激情。在一种溃败情绪和犬儒主义心态中他们不愿再去思考文学和美学那些形而上的终极问题。同

时,实用主义乘机抬头,很多人把自己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更为世俗和实用的事业中去了。

二、文化研究的挑战

面对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危机,许多学者没有回避它而是积极地应对挑战。正当他们探讨文艺学如何走出当下的困境时,一部分主要是受伯明翰学派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文艺学必须跨越当前的学科界限,去研究服饰、商场、广告、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形式,只有进行了这样一种文艺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文艺学学科才能获得新生。

由于这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持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学和艺术,文艺学目前要做的就是打破先前那种人为的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去研究审美泛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陶东风就认为:“其实,文艺学的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②金元浦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③所以现在基于那种全球化背景下媒介文化、大众文化、视像文化的兴起而进行的文艺学转向是势所必然的。他进而反问道:“作为转型期的当代文学是否有一个明确无疑的边界?我们要守卫的边界在哪里?当前大众文化与文学、影视文化与文学、图像、传媒、网络文化与文学等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然而即使是那样,我们还是要问:文学

的边界是固定的吗？”^④在金氏看来，既然传统的文学的边界已经拆除，那我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转向对传媒、消费方式、娱乐文化、城市景观等领域的研究了。

毋庸讳言，这是在文艺理论界进行新一轮的先破后立。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⑤应该说，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以便使当代知识分子介入现实，重获批判性的现实精神是他们的一种新的企求。但问题是，依靠这种所谓的“文化研究”就真的能使我们的文学理论走出困境吗？文学理论还要不要坚守文学本体这条底线？的确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文学界定，但运用反本质主义能够消解文学的最本质的内核即它的审美性、自由性和超越性吗？在大众文化身上能够体现出文学的那些最本质的特点吗？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文艺学只去研究购物中心、街心花园、流行歌曲，那文艺学还是文艺学吗？我们这样做到底是在拯救文艺学的困境还是消解它存在的合法性前提呢？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了文学本体这一底线，那么文化研究反而可能会成为文艺学走向终结的一个陷阱。那种认为通过文化研究能使文艺学实现超学科“旅行”从而建立一个文论帝国的想法至多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梦想罢了。

有些学者在文章中总是不厌其烦地罗列文化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意义，但我们认为，不管文化研究有多少种意义，那也只是文化研究的意义而不是文学理论的意义。有学者辩称：“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⑥事实果真如此吗？恰恰相反，在文学理论大举向文化研究进军的过程中，真正的我们熟悉的文学和文学理论早就被扫到爪哇国去了，里面更多的

是一些广告、图像、身体等话语的时髦叙述。而且，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现今的文化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泛政治化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⑦

当前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派是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这些学者认为，传统的文学虽然已经衰落，但文学的幽灵却开始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蔓延，文学理论要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要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流行歌曲中的文学和审美因素。我们知道，文学最基本的特性在于它的审美性、自由性和超越性，它有一种引导人们不断反思和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品格。它的这种独特的文学场域是其它的仅仅运用了一点虚构、想象等叙事技巧且现实依附性太强的审美文化所无法比拟的。而文学理论就是对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属性的一种系统概括和反思，它不是脱离而是生长在文学这块地基之上的。可以说，建筑在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上的阐释是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最终根据。而那种把文学研究作为文化研究附庸的做法则根本上已经脱离了对文学的基本理解，至多只能算是一种“伪文学理论”。

三、文学本体的坚守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研究不是我们摆脱文艺学当前困境的合理出路。那文艺学的出路在何方？怎样才能寻找到一条既切合文艺学学科实际又有现实针对性的正确途径呢？

我们先针对第一部分所列举的各种危机心态逐一剖析。

那种认为文艺学走向边缘就是文艺学的危机的看法是个假命题。笔者以为，文艺学走向边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关键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现在的文艺学学科看似边缘

化,但它从政治经济的喧嚣中走出来,正是它关注自身,进行理论体系建设的好时光。

对于那种丧失理论思辨激情的散文化心态我们需要认真地予以批判。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的构造,一定是一种艰苦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困难就绝对对它进行建构。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同样是一门关乎社会人生的大学问。一个没有文学和文学研究,失去了诗意感悟和审美理解的民族将是可怕的。

其实,中国文学理论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缺乏原创性,没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学阐释体系。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认为要适应变化了的现实,进行文化研究。但是事实上,那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或“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根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和体系,视像所产生的快感^⑧并不能代替文学的审美愉悦,文学和审美也并仅仅是什么“蛋糕上的酥皮”。^⑨那种妄图用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理论研究或解救当前中国文学理论面对的危机的做法根本就是一种学理上的错误。不同的学科门类或许有重叠交叉的地方,但并不是完全通约的。“文化研究”研究的大众文化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不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⑩它完全属于“生活美学”、“文化美学”的范畴,而文学理论研究的是文学,是对文学的理论反思,二者有根本的质的差别。笔者觉得,那种试图用从西方贩运过来的文化研究理论解救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危机的做法不但不大可能成功,而且还有使文学理论进一步泛化并最终丧失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前提的危险。因为经过文化研究一步步的蚕食、鲸吞,最后有可能导致文学在我们视野中的彻底消失。

当然,这样说并不表示我们就反对一切形式的对文学作品的文化阐释。事实上,那种以文学为本位对文学作品所作的文化内涵的发掘与目前那种大众文化研究是完全不同

的。因为它仍然属于文艺学的范围,而后者则已经是另一个学科的话题了。

笔者不否认日常生活中有审美的因素,但这至多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漂亮好看,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它缺乏心灵上的震撼。我们要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表现,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而应该向更高的精神境界迈进。对我们而言,那种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审美,它是欲望化、世俗化的,不是我们“诗意的栖居”的真正处所。试想一下,如果大家在“视觉转向”中变得只会读图了,这个世界中人的审美素质将会怎样的扭曲和降格?所以在对待大众商业文化的时候我们不能无原则的后退,要对其庸俗、落后、保守的因素保持批判的态度,防止被其同化和利用,同时要用人文精神为其导航,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大众商业文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的反思和批判的内容,成为我们的文学观照的对象,但作为一个文艺学研究者,要在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反思和体验基础上进行审美的提升,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直接地去研究大众商业文化,我们要的是研究它怎么样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存在本身,看它对我们的作家和接受者有什么样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受其影响后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前见或前理解去创作或接受一部作品的,只有这才是文学内部的事情而不是外围,才进入了文艺学所应该讨论的范围。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要对社会保持批判的立场,但是我们作为文学知识分子,应该有其特有的方式,而不是如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分子那样赤裸裸地谈论时事,议论政治,我们有我们更为审美化和超越的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批判就缺少力度,恰恰相反,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学理解进行的批判与参与社会和现实的形式是其他专业和领域的知识分子所无法替代的,是我们所独

有的。那种通过文学形象进行的批判也能够为更大的人群所理解和关注,因为它是审美的、形象的。现在的文艺学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我们能够彻底抛弃文学而去依附另外一种形式吗?没有了文学的文艺学还是文艺学吗?那岂不彻底地成为了文化学和社会学的注脚?我们的文学理论已经做了太多的附庸了,我们不希望中国的文学理论在21世纪的时候再次成为文化研究的婢女。

其实,这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很少阅读或无力面对文学作品,转向大众商业文化研究也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无边的审美泛化与文艺学的发展实在是关系不大的。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记:文学理论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解释,它的存在是以文学现象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文学现象,那么它存在的合法性就值得质疑了。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如果文学理论将自己内涵展得太宽,那无异是证明自己不存在了。”^①这位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理性的话语对那些正热衷于脱离文学本位的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啻于一副清醒剂。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要走出当前的危机主要有如下对策:其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继承古代文论传统中对我们当今文论建设有用的资源,努力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同时,也要对20世纪的文论传统进行仔细的梳理,以斟酌利用。其二,最主要的就是要坚守文学的本位立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对文学的消解态度。其三,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早在19世纪,黑格尔就曾通过绝对理念的辩证发展论证了艺术将要被哲学所代替。他说:“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

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②但是他的预言终究没有实现。我们相信,也永远不会实现。因为文学本体与人的生命本体是相一致的,只要人的审美情感表现和自由超越的内在需求还在,关于人的精神存在之证明的文学及其理论研究就不会消亡。那种声称现在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已经终结的主张至多只能算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而已。而且,我们只有在对大众文化的合理批判中坚守文学的审美性、自由性、超越性这一品格,我们才能在文化研究的汹涌势头下不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并在那种精细、独到的文学研究中,走出当前那种散文化时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

-
- ① [美] 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 ② 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 ③ 金元浦《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④ 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
- ⑤ 陶东风《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
- ⑥ 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 ⑦ 如陶东风对《蜗牛》这首歌曲充满政治化的误读,参看陶东风《警惕流行歌曲中的种族主义——从〈蜗牛〉等歌曲入选爱国主义歌曲谈起》,载 <http://www.culstud.es.com/rendanews/dispbnews.asp?id=4841>
- ⑧ 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 ⑨ 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 ⑩ 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 ⑪ [英] 伊格尔顿著,刘峰译《文学原理引论》第239—24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 ⑫ [德]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